

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上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编

目 录

上 册

- 开幕词·····胡 绳
- 闭幕词·····汝 信
- 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70周年·····陈元晖 (1)
- 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丁守和 (19)
- ‘五四’与反封建·····胡 绳 (38)
- 反封建是五四精神的精髓·····蔡尚思 (56)
- 五四运动的性质新探·····谷 方 (63)
- 中西结合, 创造新文化·····耿云志 (91)
-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启蒙运动·····张 磊 (118)
-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严家炎 (133)
- 对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再认识·····林毓生 (139)
- 五四 民族记忆之鉴·····薇娜·舒衡哲 (147)
-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陈万雄 (177)
-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沙健孙 (197)
- 对五四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反传统主义
的反思·····莫里斯·梅斯纳 (223)
- 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观和传统文化·····黄颂康 (237)
- 对全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王富仁 (265)
- 论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彭 明 (285)
- 重评“文化调和论”·····丁伟志 (304)
-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徐宗勉 (331)
- 新文化运动: 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发展与

转变·····	章开沅	罗福惠	(353)
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	王桢林		(374)
“五四”文化价值取向论略·····	黄克剑		(394)
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与五四运动·····	林 岗		(411)
略论五四时期的人权思想·····	熊月之		(435)
“赛先生”与新文化运动·····	樊洪业		(447)
启蒙运动的曲折道路·····	汪澍白		(464)
预言与危机·····	汪 晖		(490)
五四运动与当代的思想解放·····	李鹏程	汝 信	(532)
五四的反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热·····	胡思庸		(548)
论当代中国文化的选择和重建·····	王鹏令		(558)
五四思潮与中国文化·····	杨 义		(578)

下 册

“五四”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张岂之		(625)
“五四”精神：继承与超越·····	何 新		(642)
科学、民主、反传统·····	韦政通		(655)
纪念五四 发扬爱国主义·····	张岱年		(673)
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	金冲及		(679)
艰难的求索·····	金忠明		(698)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	戴 逸	杨念群	(721)
从反“孔教”运动到“非宗教大同盟”运动·····	赵 清		(733)
神圣面包·····	小野信尔		(755)
“五四”新文学的诞生·····	樊 骏		(784)
人本主义思潮与“五四”新文学·····	叶子铭		(808)
“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	钟敬文		(835)

“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	王 瑶 (876)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日据下台湾新文学运动	王晓波 (894)
五四运动和蔡元培的品格素质	李 侃 (922)
“五四”时期陈独秀国民运动的思想与 新文化运动	朱成甲 (934)
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发展	唐宝林 (961)
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	杨天石 (988)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习五一 (1013)
五四运动的精神背景	狭间亘树 (1038)
五四时期的史良	周天度 (1053)
论民族工业“黄金时期”和国内市场的形成	森时彦 (1071)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俄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 影响的若干方面	谢尔盖·齐赫文斯基 (1100)
五四运动与日本	野泽丰 (1116)
编后记	(1124)

开 幕 词

(1989年5月5日)

胡 绳

在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而举行的以“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开始的时候，我简单地讲几句话。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运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发生于这次爱国运动前，但习惯上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两三年间的新文化运动，直接诱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并且通过这次爱国运动而更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从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失去独立的地位。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封建主义的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在中国开始生长，但民族资本并不能自由地发展。人民遭受严重的灾难。为改变中国的命运，五四运动以前的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斗争。五四运动为这种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经过血和火的长期斗争的道路，以无数人的牺牲为代价，中国终于在20世纪40年代末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历史。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能够用自由的手建设自己的国家，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总是带着敬意追念五四运动。

五四时期的人们所企望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他们所要建立的新文化是与现代化的国家相适应的新文化。虽然他们不可能完成这个工作，但他们的确做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应该做的和可能做的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

猛烈地抨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封建的旧道德、旧礼教。他们提倡白话文以代替文言文的正统地位，提倡个性解放以冲破封建罗网的束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的业绩是不可埋没的。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水平来责备他们的某些偏激的、片面性的言论，也不能以为我们现在不过是重复做他们的工作。

中国人民现在的任务是要使拥有11亿人口的中国根本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面向21世纪，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的确是艰难的任务，在实现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符合于世界和中国的潮流的，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方针、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因此，我们有充分信心用几十年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

五四运动以后的许多年间，在中国文化问题上有过多种不同的意见，有过多种争论。也许可以说，有一点是由实际生活证明了的，这就是，文化的发展是与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可分割的。既然中国的经济、政治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末文化思想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因此，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切成果，倒退回去，复辟封建旧道德、旧礼教的统治地位的任何主张都是行不通的，不可取的，有害的。

另一方面，实际生活证明，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少有否定民族传统的一切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如果把民族传统分为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取其一部分而排斥另一部分，这种办法好像是可行的，但其实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被认为精华的，并不能简单地存留，被认为糟粕的，也不见得就能简单地抛弃。现在我们所说的民族传统，既包括中国长期古代历史遗留下的一切，也包括近一百几十年的历史经验。对民族遗产如何进行选择、扬弃、改造、提高、锤炼，使之有益于现代化建设，而避免其对现代化事业的妨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题。但无论如何，企图把民族传统的一切东西丢到垃圾堆里去，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取的。

和对民族传统的态度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可以说，历史已经做出结论。关门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使中国文化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既不可能，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极为有害。另一方面，全盘西化也是错误的。五四时期的人虽然提倡西化，但他们其实是把它当作现代化的代名词来说的。五四以后，许多人渐渐看到，中国不可能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30年代有的主张全盘西化，其实是主张全盘资本主义化的人自己说，这不过是极而言之。显然，西化而又是全盘，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现代化，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也要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验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绝不能搬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不但如此，而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具有中国的特色，照抄任何外国的模式都是行不通的。

我说以上这些话，并不是说，在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切问题上已有定论。如果上述的一些说法能够成立，也还只是粗枝大叶的泛论。稍加追究，就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在中国文化建设这个总题目下，学术界还就其他许多问题，提出种种不同的意见，进行过有益的讨论。

这次学术讨论会集合了中外许多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有兴趣、有见解的学者。我们并不指望经过几天的讨论，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公认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为从各种不同角度的意见，各种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意见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我们相信，对于抱有任何意见和主张的学者都是有益的，对于促进学术界更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是有益的。

谢谢大家。

闭 幕 词

(1989年5月7日)

汝 信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经过三天紧张热烈的讨论，今天就要结束了。自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倡议召开这次学术会议，在整个筹备过程中一直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朋友们的全力支持，单从数量上来说，会议收到的论文就达120多篇，印发给与会学者的93篇，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学者有20多位，在分组会议上发言的就更多了。应该说这次学术讨论会能够顺利地进行，取得一点成绩，这首先是有赖于与会的各位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大家共同的努力，特别是有些学者不远千里而来参加会议。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和学者们的发言，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各个层面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了分析探讨。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或者如某些人所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对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等等的影响都是无可否认的。而且五四运动的精神在当代中国也仍在起作用，赛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国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因此，大家对五四运动表示了强烈的兴趣是很自然的。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实上，对于五四运动应如何评价，如何总结其经验教训，如何利用这个经验来进行当代中国的

文化建设等等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决不是想对某些问题达到一致的认识或结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在这次讨论会上，就某些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这是正常的，很有益的。我们的目的只是想借这个机会使各种不同的意见得以交流，互相交换看法，展开自由的学术讨论，来加深相互的了解，来共同促进对五四运动的学术研究。我想，我们这次讨论会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的，做到了互相交流学术观点和自由讨论，所以是成功的。如果说有所不足，那就是因为时间所限，有的学者可能没有畅所欲言，相互间的讨论也可能不够。好在提供的论文已经印发给各位，我们建议在会后还可以根据这些论文通过其他各种途径继续进行交流和讨论。还有一点需要说一下，我们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为了开好会议，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很辛苦，但是因为条件的限制，在会务工作如论文材料的及时印发和生活方面可能还有疏忽，对诸位如有招待不周之处，我表示歉意，并希望多多谅解。

会议结束后，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即将离开北京，我们祝他们回去时旅途愉快，一路顺风。

现在宣布“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

谢谢诸位。

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70周年

陈元晖

一、引言

7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古稀”之年，杜甫的名句“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慨叹七十岁的人的稀少。70年，对国家、民族来说，只不过是一瞬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历史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做一面镜子，看清自己的尊容。70年前出现过的事实，能否算作古？能否从70年之前出现过的人物看出得和失？70年不能算“古”，现在仍健在的人中间，就有不少人亲眼见过五四运动，其中的少数人还亲自参加过这一伟大运动。70年虽然不算古，但这70年却是震古铄今的时代。本世纪刚进入第11年，延续2117年的封建帝王专制制度（从汉代算起）一举被推翻。8年后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之后30年，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虽然70年对国家、民族只是一瞬间，但这一瞬间的历史意义，超过以往两千年。因为这70年，是划时代的70年，封建专制制度处于不合法的地位，而人民可以当家作主却是合法的。不管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程度，但毕竟它是合法的，人们都必须尊重这种地位。违反人民利益的事，当权者是不敢公开干的。这种合法的地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得来的。得来是不容易的，保护也是不容易的。70年的时间短促，但它是新时代的70年，是与过去两千年截然不同的70年，无论在政治制度上、文化形态上、经济政策上，都应该进行系统的总结。70年时间虽然短，但它一样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看出兴替，看出得失。40年来，

中国近现代史，出版过不少种，不少册，但却缺少一本文化史，缺少这样一面文化镜子，照出文化方面的兴替得失。梁启超晚年曾开始执笔写一部中国文化史，但未写完即赍志而歿。一本通史，内容几乎全是政治史，没有文化史的内容，经济史的内容也不多。没有文化能形成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吗？但我们读到的大多是没有文化史。应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写出一本中国文化史，让读者们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看到兴替和得失。这是学术界急不容缓的事业。写中国文化史要先从这70年开始。

文化问题，现在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文化”这一概念包括哪些内容，是否有一致的看法？文化与教育有无区别？从空间上是否分为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又是否可以分中学和西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呢？可不可以把文化分为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全盘西化是发展中国的途径吗？从时间上是否可以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文化是否具有再生性的特点？根据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评估文化？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怎样？这许许多多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尚未解决，尚在争论中？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写出一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史书，对这些问题都必须先加考虑。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经过整整70年了，是总结经验的较好时期。总结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将给今后发展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比较科学的指针，避免以历史代替科学，以纷争代替共识。

二、论文化含义，兼论教育和文化的关系

“文化”这一词，最早见于汉朝刘向所著的《说苑》上，含义为文治教化。他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这里“文化”是与武力对称的一个词，不是现代的“文化”含义。现代的“文化”是指社会文明进步的总称，包括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所取得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成绩，具体地说，是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的总合体。台湾省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

“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①有的学者还把“意识形态”包括在“文化”这一概念之内。“文化”又是考古学上的名词，指用同样的工具制造出具有同样技术水平的产品的一个历史时期，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又是人们口语中常用的一个词，如此人有文化，此人文化水平高，学习文化等等，这里“文化”一词，仅仅是指知识水平或识字能力。

“文化”一词用在革命运动上，说明它不同于武力革命，不同于用暴力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但它是具有群众性的，并且最后也能殊途同归，共同达到革命目的。五四运动一方面是指群众的革命运动，一方面是指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群众革命运动发动之前，它起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思想教育的作用。在群众革命运动告一个段落以后，它又发挥了巩固革命成果和发展革命成绩的作用。五四群众革命运动是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发动起来的，但新文化运动早在它发动的前几年就已经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动员，一个大学——北京大学和一个杂志——《新青年》的功绩，是不会被忘记的。1919年1月，《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即号召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两位先生共同的敌人是国粹和旧文学，所以就从文学方面为突破口，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胡适也在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至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所作的《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及《劳工神圣》的演说，都起到动员的作用。五四运动的目的

^① 见《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自叙。

是要求科学与民主，这些目的，都在事前的动员和宣传上，广泛地谈到了。国粹和旧文学，是维护专制政治统治的工具，又是愚民的手段，选择这里为突破口，以后的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革命起到思想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这同朴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发展今后社会主义文化应起到什么作用，哪些做法是可以继承的，哪些做法是应该否定的。是否也可以像对古代传统文化那样，一方面继承，一方面批判，是不是也要分清其精华和糟粕，继承其精华，摒弃其糟粕。这些问题都应该结合历史经验、结合当前实践，进行科学的总结。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运动的关系，应该作为总结经验的一个重点，但过去写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则多偏重于文学革命运动、政治运动或科学运动的经验。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运动是分不开的。文化运动落到实处就是教育改革，而发展科学也同样是这一个道理。

“文化”是一个新名词，它是从culture这一个外文字意译过来，它作为“文化”解，也作为培养、教化、教育、训练等解析。这个词本来的含义是耕种。现在文化的含义扩大了，变成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习惯的总称。而education一字是“教育”，同样也可以作训练、教养、修养、培育、培养解。所以从字面上解，外文的文化和教育两个词是一个含义，但以后文化的含义包括广了，教育这一个词，就专门用在培养新一代在德、智、体及美感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活动了。

文化运动从学校发生，以后扩展到校外社会中去，从文字革命发展到政治、伦理、法律、风俗、习惯、艺术方面去，这是五四运动的特点。五四运动又是从教育机关发展到工厂、农村、机关中去，这也是这一次革命的特点。由这一点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运动的密切结合。

五四群众革命运动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是众所共知的事实。李大钊同志在五四运动前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法俄革

命之比较观》、《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新青年》杂志，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对当时的教育界、学生界和知识分子都具有启迪的作用。由知识分子带头，扩大到工、农、商各界，民主和科学的要求，是激发当时群众情绪的两大支柱。宣传在先，组织继之，一年后就有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两年两个月后就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使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运动，有核心的领导组织，继续进行要求民主与科学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无论在运动前的宣传活动和以后核心组织的出现，知识分子是起了“先行者”的作用。从组织路线的发展来看，是从留法学生、大学生、教师扩展到工厂的工人、城市的贫民和乡村的农民。五四运动的革命史，证明革命要有知识分子，在革命发动之前，他们起了宣传群众的作用，革命发动以后，他们又是组织群众的一股中坚力量。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或群众革命政治运动，学校是一个运动基地，是不能否认的，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是中坚力量的组成部分，也是不能否认的。这特别是对五四运动可以这样说的。这也足以证明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我们不是教育救国论者，也不是知识分子高超论者，但革命需要人才，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是从教育培养出来的。革命需要在革命运动发动之前，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宣传，这样的宣传也就是教育。革命运动的组织者，也必须经过培养和训练。文化运动离开教育这一片基地，将得不到人力和给养的补充。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教育。在这一篇文章里，也就首先说到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不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谁都没有否定，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第13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实践并不如此。今年纪念五四，要大力呼吁重视教育，为教育做一些实事，为教师提高生活待遇，这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纪念此日。

三、文化问题上的争论之一：中学与西学

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就需要进行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增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畸轻畸重。但这几年的实践，不是这样的，是有轻有重的。我们重于物质文明建设，轻于精神文明建设。这种轻和重的表现，不在于说，而在于行。虽然在政策上一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但在社会坏风气、贪污腐化、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官僚主义上却不见弭止。过分相信“衣食足然后知礼义”的社会学说，不真正了解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同步前进。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轻视精神文明建设（其中教育处于重要地位），使我们吃了不少亏。文化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畸轻畸重就会成为跛脚骡子，匍匐不前。文化建设必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这个道理已经为人们所了解，但在文化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争论，其中所谓新的，其实是老问题，已争论了几十年。不过，现在的争论增加了新内容、新论点。文化问题上现在争论最多的，仍然是中学与西学之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呢？东西文化孰优孰劣，全盘西化是否可以作为目前提倡发展文化的方针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是由孙家鼐于1896年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摺子》上说：“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一切均应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其后（1898年）张之洞在他所著的《劝学篇》内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①又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享；不必尽索之于经文，亦必无悖于

① 《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经文。”^①同年，由梁启超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也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祇增习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是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思潮，包括名官僚张之洞和名学者梁启超，都是一致主张的。这个主张实际上是为了保持封建礼教，保持封建伦常，保持封建习俗制度，这都是为了保持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权为其最终目的。这个八字方针，经过五四运动，遭到严重的打击。视接受西方文化为“舍己而芸人”的保守、反动思想遭到痛击以后，代之而兴的是大量吸收西方的科学和西方的民主精神。民主与专制的搏斗、科学与愚昧的搏斗，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经过俄罗斯、法兰西、德意志传入中国，两年后就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并没有被完全打垮，反映在文化思潮上，抗拒五四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又死灰复燃。北洋军阀政府及不少地方军阀，以及一些封建文人和清朝的遗老、遗少，又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口号下，为旧礼教、旧伦常、旧政制进行复辟。虽然他们的力量有限，但不能不在某些人的头脑里发生一些作用。甚至迟至16年后，又出现了“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1935年，由国民党地区的10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不是恢复上一世纪孙家鼐和张之洞等人的主张吗？皇帝没有了，代替他的是总统和主席，君臣关系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公仆”和人民的关系。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须保持，一些教授认为，与文化来说，文化的建设，还必须以中国为本位来进行，要建设一种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中国本位”和“中学为体，”从字面的意义上来讲也没有多大差别，从思想深处来看是万变不离其宗，文化可以吸收西方，但不能影响统治权，不能破坏旧政治制度。文化可以是新的，但政治制度一定要保持旧的。五四运动的两

^① 《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大任务，一是科学，二是民主，在他们看来，科学可以接受，但民主却是洪水猛兽。他们对这样的一个真理：“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科学的发展”，却是一窍不通。五四运动的70年，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是一个阶段，后40年是一个阶段。后40年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人民当家作主却是被公认的，是公认为合法的。但你能想到在这后40年中却有10年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法西斯政治是毁灭文化的，在30年代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爱因斯坦不是逃亡到美国去了吗？“十年文化大革命”是10年的文化大破坏。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必须有政治的民主，70年的历史，不是很好的一面镜子吗？

五四运动前后，在反对“中学为体”的潮流中，有一部分教授、学者，主张“全盘西化”，以它来反对“中学为体”。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美国的留学生，以胡适为突出的代表。胡适的“全盘西化”的提出，不是在1929年，在这之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即具有这种思想。以后，他不同意“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又提出这个问题。在1929年，他为《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人对西洋文化有三派主张：一派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中派，三是充分西化。他当然不是第一派，但也反对“选择折中派”，因为他认为“选择折中派”，骨子里仍然属于第一派的保守派，所以他主张全盘的西化。后来，潘光旦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发表了不同意胡适的“全盘西化”的主张，提出他可以接受“全力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但不能赞成“全盘西化”。胡适在1935年6月22日写了一篇题为《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的文章，认为：“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胡适是这样被迫让步的，但这种让步只是为避免名词上的争论，思想还是“全盘西化”的思想，因为他争辩说：“全盘”是百分之百的意义，“充分”虽然算不得“全盘”，但它可以包括99%。就是用这样的理由，勉强同意取消“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